

從《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談起

● 潘光哲

光緒四年郭嵩燾在倫敦讀報，得知英國「遣世爵阿伯爾寬斯木爾登赴意大利致其新君寶星」的消息後，在日記中寫道：「西洋言政教修明之國曰色維來意斯得，歐洲諸國皆名之。……歐洲各國……其視中國，亦猶三代盛時之視夷狄也。中國士大夫知此義者尚無其人，傷哉！」「色維來意斯得」，即civilized。



雷迅馬 (Michael E. Latham) 著，牛可譯：《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社會科學與美國對第三世界政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

光緒四年二月二日(1878年3月5日)，大清帝國駐英欽差大臣郭嵩燾在倫敦讀報，知道了英國「遣世爵阿伯爾寬斯木爾登赴意大利致其新君寶星」的消息，對甚麼是「寶

星」，他大感興趣，經過一番探問，始知曉其大概；用今天的話來說，「寶星」者，勳章也；「致寶星」，即贈勳章，是國際外交行為的共同禮儀之一。郭嵩燾弄清楚了這套禮儀格式，便聯想到英國報紙批評英國贈勳(「贈寶星」)給「波斯國主」之舉為不當的議論①：

近年波斯國主遊歷倫敦，君主亦贈以寶星。《代謨斯》新報頗訾之曰：「哈甫色維來意斯里[得]，何足以當寶星也？」蓋西洋言政教修明之國曰色維來意斯得，歐洲諸國皆名之。其餘中國及土耳其及波斯曰哈甫色維來意斯得，哈甫者，譯言得半也，意謂一半有教化，一半無之。其名阿非利加諸回國曰巴爾比里安，猶中國夷狄之稱也，西洋謂之無教化。三代以前，獨中國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遠之於中國而名曰夷狄。自漢以來，中國教化日益微減，而政教風俗，歐洲各國乃獨擅其勝，其視中國，亦猶三代盛時之視夷狄也。中國士大夫知此義者尚無其人，傷哉！

「色維來意斯得」，即civilized；「哈甫色維來意斯得」，即half-civilized；「巴爾比里安」，即barbarian。以「文明」、「半文明」與「野蠻」這樣的觀念來認知人類世界，在當時的西方世界甚囂塵上，早在十九世紀初期，出生在丹麥而以法國地理學家留名於世的馬爾特—布倫 (Conrad Malte-Brun) ②，便已將這些詞彙導入地理學研究領域，在他那裏，「半文明」與「野蠻」其實是同義語；至於在十九世紀美國廣泛通用的地理教本之一：米切爾 (Samuel Augustus Mitchell) 的《現代地理體系》(System of Modern Geography, 1839年問世，至1882年間屢屢重印廣為使用) 裏，人類世界可以區分為這樣的高下階序：蒙昧、野蠻、半文明與文明開化這四個社會階段，各類

人種／族國自有其位置③。同一時段，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 (Lewis H. Morgan) 的名著《古代社會》(Ancient Society) ④裏，更建立了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的序列史：蒙昧階段、野蠻階段及文明社會；前兩個階段又可分成三期，即初期、中期和晚期，每一期的社會狀態 (the condition of society) 則可相應地各自區分為低級、中級與高級。每一個階段都包括一種不同的文化，並代表不同的生活方式。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則亦本於摩爾根，企圖承續亡友馬克思以「唯物主義的歷史研究所得出來的結論來闡述摩爾根的研究成果」的企圖 (摩爾根與恩格斯的述說，更因1930年郭沫若

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在其名著《古代社會》裏建立了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的序列史：蒙昧階段、野蠻階段及文明社會。中國之位居「哈甫色維來意斯得」(半文明)的地位，是那個時代西方的共識。對於中國處於如是「恥辱」地位，郭嵩燾有着無限的感慨與自慚。圖為十九世紀西方人所繪的中國和緬甸地圖。



對於中國邁向「現代化」／「發展」的動力何在，各家論者思言所及，則各有巧妙。一句話，「以西方聖人之心法為心法」成為中國為自己所設定的前景藍圖；至於那些西方的概念架構是在甚麼樣的具體歷史／現實脈絡裏問世的，完全不加反省，照單全收。在今天某些熱情擁抱「後殖民論述」的論者身上，不是一樣可以看到這樣的「學術盛況」嗎？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問世，而為二十世紀的中國學界所廣知^⑤。摩爾根（與馬、恩）的「工作」是十九世紀（特別是1860至1870年代）人類學家發現「原始社會」的成果之一^⑥，他們的業績所得，更為這樣的論述提供了無窮盡的素材。所以，中國之位居「哈甫色維來意斯得」的地位，是那個時代（由「科學」提供保證）西方的共識。對於中國處於如是「恥辱」地位，「歐洲各國」之「視中國」猶如「三代盛時之視夷狄也」，郭嵩燾有着無限的「感慨」與「自慚」。

當個人讀畢《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此書，聯想到的就是《郭嵩燾日記》裏的這個例子。百年前的郭嵩燾，沒有理解他的「感慨」與「自慚」其實是掉進「西道中心主義」（Western logocentricity）陷阱的思想／知識資源，無可厚非；揭露那種「西道中心主義」製造的「論述與再現體制」（regimes of discourse and representation）^⑦所潛藏的知識／權力關係，至今（且永遠）猶為未竟之業。然而，即使在我們當下的思想／知識視野裏，以「蒙昧」、「野蠻」階段及「文明」這種簡易的模型來化約千樣萬態的人類社會／歷史，甚至於為之劃分高下，排出贏家／輸家的隊伍，已必定被鳴鼓而攻之。遺憾的卻是，前門驅狼，後門來虎。曾幾何時，「現代化」或「發展」卻成為我們在理解和認知世界的概念地圖上認方辨位的工具。於是，對中國來說，郭嵩燾式的感慨與自慚，就不絕如縷了，未曾「現代化」／「發展」的中國，取代了「哈甫色維來意

斯得」的中國；並各自指引了國族的前進方向：中國要步向「色維來意斯得」，中國要邁向「現代化」／「發展」。至於朝這等方向前進的動力何在，各家論者思言所及，則各有巧妙；它們的意義，還被學術工作者編織出以「啟蒙」與「救亡」這兩個「固定樂思」（the *idée fixe*）為基調的交響曲。一句話，「以西方聖人之心法為心法」成為中國（知識份子）為自己（所認知的族國）所設定的前景藍圖；至於那些西方的概念架構是在甚麼樣的具體歷史／現實脈絡裏問世的，完全不加反省，照單全收。這樣的情境，直到今天，猶未止歇，在某些熱情擁抱「後殖民論述」的論者身上，不是一樣可以看到這樣的「學術盛況」嗎？

因此，閱讀這部書，便讓我聯想到，即使我們的人文社會科學宣稱要「中國化」／「本土化」，甚至要「以彼之道，還諸彼身」（如《天龍八部》裏慕容家的「絕技」），首先就該毫不留情地面對剪不斷、理還亂的真理／知識／國家／權力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的問題。如雷迅馬所揭示的，「現代化理論家」：

他們使用的語言模糊了政治判斷這個固有的問題，而他們正是以這種語言將「意識形態」隱藏在他們的方法論力量背後。理論家們試圖在科學的完整性與知識武器的製造二者之間進行調和，所以他們強調，而且也總是相信，自己和國家權力之間的關係不會影響到他們所生產的「真理」。無論是面對外國聽眾還是本國聽眾，他們都會論證說，現代性和現代化都不是政治建構的產物，

它們都是社會科學研究所揭示出來的客觀現象，它們是事實（頁80）。

亦或正如另一位也要揭開「現代化理論」神秘面紗的研究者吉爾曼（Nils Gilman）^⑧之所謂^⑨：

因此，現代化理論不僅是對第三世界正發生些甚麼的論述，而且還是美國已經是甚麼的論述。

像雷迅馬與吉爾曼從具體的歷史情境（冷戰與美國自身的思想傳統）來解剖自身的人文社會科學傳統，對台灣的學術社群的啟示至少便是：我們所承襲的人文社會科學傳統，進行知識生產的實踐活動，都必須再歷史化（rehistoricize），都要安放在它們得以降臨問世，並在我們認知／解釋世界的領域裏得到正當性，乃至積習累慣，轉化為傳達給社會公眾的那些理所當然的常識，這樣的脈絡裏，予以認識／反思。即如雷迅馬所明確指出的，現代化理論與美國歷史上源遠流長的「天命昭彰」（Manifest Destiny）觀念和帝國主義意識形態間的關聯（頁336-37）。至於他細膩講述三則具體個案（爭取進步聯盟、和平隊和越南戰爭期間的戰略村計劃）的故事，對欠缺背景知識的讀者如我而言，毋寧則是藉由這趟知識旅程而得到「現代化理論」和社會科學家是如何對美國對外政策產生影響的認識歷程。

但是，「現代化理論」在域外的「理論旅行」（traveling theory）^⑩的故事，絕對不是水到渠成。畢竟，觀念和理論從這一種文化向另一種文化的移動，在具體的知識生產過

程裏，都有錯綜複雜的際遇。在1960年美、日「交流」的「箱根會議」上，「現代化理論」的闡釋，絕對不僅是以美為尊的，還涵括着日本自身的學術傳統的實踐。當日本學者使用「封建主義」（feudalism）這個詞的時候，與會的美國學者起而斥之曰那是個既沒有精確定義又會引發憎惡與弊端的情緒字眼，而完全不曾注意到，「封建主義」一詞在日本學界的傳統與相關情境：早在1920年代，日本學界關於日本資本主義的爭論，以「勞農」派VS.「講座派」為表現，況且，當時界定中國封建主義的論爭，亦是熾熱非常^⑪。這樣的事例正提醒我們，述說「現代化理論」在域外「理論旅行」的故事，不要忽視了彼方的學術／思想淵源。

那麼，就反省台灣（與當下中國）的「現代化理論」的論述形構（discursive formation）而言，我們的認識視野，同樣應該可以更寬廣些。好比說，1960年代的殷海光，搭起來的「中國文化在近百年來遭遇西方近代西方文化之衝擊時所作反應的實際的進程」的架構是：從「器用的現代化」到「制度現代化」再到「思想現代化」^⑫。然而，潛藏在他建構己身述說的架構裏的，會不會是和「現代化理論」的知識譜系一點關係都沒有的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我目前也沒有答案。但是，恕筆者淺學，詳盡疏理殷海光的思想資源，至少是漢語學界裏一片「殷海光熱」的既有成果都還未曾完全做到的事業^⑬。

真理／知識／國家／權力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都應該從具體的歷

雷迅馬明確指出了現代化理論與美國歷史上源遠流長的「天命昭彰」觀念和帝國主義意識形態間的關聯。但是，「現代化理論」在域外的「理論旅行」的故事，絕對不是水到渠成。畢竟，觀念和理論從這一種文化向另一種文化的移動，在具體的知識生產過程裏，都有錯綜複雜的際遇。

社會科學與現代國家之間的共謀互生關係，要從具體的歷史脈絡裏被揭露出來。《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言及羅斯托和白魯恂等社會科學工作者如何為「現代化理論」而嘔心瀝血卻聲名狼藉的脈絡，亦深具反思之功。就中國脈絡而言，社會科學與現代中國的建國大業之間的關係，就是值得投注心力的領域。

史情境出發。社會科學與現代國家 (state) 之間的共謀互生關係，要從具體的歷史脈絡裏被揭露出來^④。《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言及羅斯托 (Walt Whitman Rostow) 和白魯恂 (Lucian Pye) 等一流的社會科學工作者 (用牛可的話來說，這一群出類拔萃的「美國冷戰知識份子」^⑤) 如何為「現代化理論」而嘔心瀝血卻聲名狼藉的脈絡，亦深具示範啟益的反思之功。就中國脈絡而言，社會科學 (工作者) 與現代中國的建國大業 (state-building) 之間的關係，就是值得投注心力的領域^⑥。像陶孟和早在1910年代末期便開始進行社會調查，人類學者如吳文藻，經濟學家如何廉，亦各有貢獻^⑦。至於投入實際政治行列的社會科學家，如1920年代號稱「好人政府」的財政總長羅文翰；1930年代投身宦海的王世杰 (歷任教育部長等職)、蔣廷黻 (歷任行政院政務處長等職)，亦不知凡幾。社會的公眾議論，則鼓動着這樣的思維，如《國聞週報》刊出〈社會科學者應當努力〉的專論，倡言曰^⑧：

吾人丁此世界未有之變局，適逢本國長期之革命，應如何擷汲新潮鎔化中外，使中國之政治、法律、經濟、社會諸種建設與改造，別出機樞，卓然有以自立。此種工作，胥宜由社會科學家躬負責任。

書寫中國現代人文社會科學體制的「學科史」，理解它們發展的經脈流變，並且盡可能地跳脫「西道中心主義」的觀察／評估角度，展現知識／權力的毛細管關係，刻不容

緩。即如拉比諾 (Paul Rabinow) 思索人類學如何在認識論領域裏描述「他者」(other)，提出的研究策略之一，便是主張「我們需要將西方人類學化」(anthropologize the West)，要顯示它對真實的建構其實是外來的 (exotic)，要盡可能揭露那些理所當然、放諸四海皆準的思想領域 (如知識論和經濟學)，其實只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要顯示對真理的宣稱，其實是和社會實踐聯結在一起，因此在社會世界 (the social world) 裏變成了可以付諸實現的力量^⑨。亦且，念茲在茲，提醒自己掌握／生產的知識，可能促發甚麼樣的權力支配關係，或為甚麼樣的權力支配關係「搽脂抹粉」，也應是學術工作者銘刻在心，懸諸案頭的基本自律^⑩。

埃普爾比 (Joyce O. Appleby)、韓特琳 (Lynn A. Hunt) 和雅各布 (Margaret C. Jacob) 嘗謂：「二十世紀的專業歷史通常都是在『現代化』的印迹下寫成的。」^⑪誠然。惟讀竟《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至少，我們對《現代化的中國》之類的著作，還該不加批判地照單全收，並且還能讓它們生生不息，世襲傳之嗎？

註釋

① 郭嵩燾：〈光緒四年二月二日日記〉(1878年3月5日)，載《郭嵩燾日記》，第三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頁438-39。

② 關於馬爾特—布倫的傳記資料，見http://27.1911encyclopedia.org/M/MA/MALTE_BRUN_CONRAD.htm (2004/2/18)；惟 Susan Schulten 引據 Daniel

Calhoun, "Eyes for Jacksonian World: William C. Woodbridge and Emma Willard" 而謂馬爾特—布倫出生在荷蘭，於1800年流亡到巴黎，見Susan Schulten,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in America, 1880-19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95；本文不詳考辨。

③ Susan Schulten,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in America*, 94-97 (她所徵引米切爾的社會階段圖，見頁96)。

④ Lewis H. Morgan, *Ancient Society*, ed. Leslie A. White (1887; reprint,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中譯：摩爾根著，楊東莼、馬雍、馬巨譯：《古代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1977)。

⑤ 相關述說，參見潘光哲：〈摩爾根、馬克思、恩格斯與郭沫若——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淵源的討論〉，載《東亞近代思想與社會：李永熾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台北：月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頁363-409。

⑥ 參見 Adam Kuper, *The Invention of Primitive Society: Transformations of an Illusion* (London: Routledge, 1988), 42-75；本書非僅疏理如Lewis H. Morgan等早期學者的業績，亦下探二十世紀的列維—施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等人的思索，反省「原始社會」這個概念在人類學的發展史裏所以成為(核心)研究課題的歷程，不贅。

⑦ "Western logocentricity" 與 "regimes of discourse and representation"，均引自Arturo Escobar,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10, 17。

⑧ 他的新書是：Nils Gilman, *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⑨ Nils Gilman, "Modernization Theory, the Highest Stage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Staging Growth: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Global Cold War*, ed. David C. Engerman et al.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3), 57。

⑩ Edward W. Said, "Traveling Theory", in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226-47；本文已有漢譯：賽義德：〈理論旅行〉，載劉少波等譯：《賽義德自選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頁138-61。

⑪ 引自Victor Koschmann, "Modernization and Democratic Values: The 'Japanese Model' in the 1960s", in *Staging Growth*, 235；Koschmann還分析了參與「箱根會議」之日方學者的知識／思想背景(頁246-47)，不贅。

⑫ 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下)》，林正弘主編：《殷海光全集》，第八冊(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0)，頁508-30。

⑬ 至少沒有做到傅大為的兩篇成果達到的深度：傅大為：〈科學實證論述歷史的辯證——從近代西方啟蒙到台灣的殷海光〉，《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一卷第四期(1989年1月)，頁1-56；傅大為：〈由台灣思想史中的一個歷史轉折看發言權的取代與轉型：從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過渡到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載《自由民主的思想與文化：紀念殷海光逝世二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自立出版社，1990)，頁182-206；關於哈耶克在台灣，並可參見熊自健：〈戰後台灣的自由主義者與海耶克思想：以殷海

光、夏道平、周德偉為例〉，載宋光宇編：《台灣經驗(二)社會文化篇》(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

⑭ 中文簡述可參見維特羅克(Björn Wittrock)著，馮炳昆譯：〈社會科學與國家的發展：現代性問題論說的變化情況〉，載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編：《社會科學與公共政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1-19；英文論集，不可勝數，例如：Peter Wagner, ed., *Social Sciences and Modern States: 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Theoretical Crossroa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筆者亦捧讀是書，收益不少，蓋是書所收諸文採跨國比較觀點，除英、美等為眾所知的國家的情況外，還包括丹麥、瑞士、波蘭、日本、巴西等國的情勢，雖以背景知識不足，未必可掌握其要旨，然已發深啟，如言及巴西軍事教育裏涵括的現代科學課程，如何為當地的國家政策規擬提供人才，亦使科學為現代國家服務的理念得以深入人心，如1810年創立於里約熱內盧的皇家軍事學院及此後的演變，即是一例，而馬克思主義在巴西的傳布，亦是這種社會工程和軍事傳統(social engineering and militant tradition)的結果(見Simon Schwartzman, "Changing Roles of New Knowledge: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Societal Transformations in Brazil", 230-60)。

⑮ 見牛可：〈國家安全體制與美國冷戰知識份子〉，《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3年10月號，頁28-41。

⑯ 筆者涉閱所及，江勇振已有所探索：Yung-chen Chiang, *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19-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然稍偏重於「社會工程」論與社會學領域

的情況；王晴佳對史學領域的探討，亦有可觀：Q. Edward Wang, *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 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但未措意於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在這方面的成績的討論。

⑰ 筆者所知，如：智效民：〈陶孟和：中國社會學的奠基者〉，《學術界》，2002年第5期；王銘銘：〈民族與國家——從吳文藻的早期論述出發〉，《雲南民族學院學報》，1999年第6期、2000年第1期；徐振國：〈何廉及南開經濟學家對戰後經濟政策發展之議論〉，《東吳政治學報》，第14期(2002年3月)。

⑱ 〈社會科學者應當努力〉，《國聞週報》，第七卷第七期(1930年2月24日)；文末註「錄二月十九日天津《大公報》社評」。

⑲ Paul Rabinow, "Representations Are Social Facts: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in Anthropology", in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ed.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 Marcus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241。

⑳ 如葉啟政謂：「社會學知識是壟斷性的權力形式」(葉啟政：《社會學和本土化》[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1]，頁41)。明白承認自己從事的行業，可能有這樣的「危險」的台灣學者，大概不多。

㉑ Joyce O. Appleby, Lynn A. Hunt, and Margaret C.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94), 77.